

费密的教育思想

李义让

贺锡玉

费密(1623—1699),字此度,号燕峰,人称跛道士,四川新繁县(现属新都县)人,明清之际的著名诗人和思想家。九岁丧母,自幼聪明好学。年轻时,曾组织武装力量对抗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失败后流寓泰州(今江苏泰州市),授徒著书终身。著有《中传正纪》、《弘道书》、《燕峰集》等书。

费密在历史上很受推崇。生前曾受到同时代的著名学者孙奇逢、吕留良,著名诗人钱谦益、王士禛,著名文学家孔尚任等的推崇,“人得片纸皆珍藏之”^①。乾隆时期著名诗人蒋士铨盛赞他为“乱世文中子”^②。清末学者钟炳灵在《校刻弘道书序》中指出:“有清以来,硕学大师若孙夏峰、黄梨洲、阎百诗、顾亭林之外,文章学术足与王船山、颜习斋鼎足而峙者,惟厥先生。”^③及至民国时期,胡适和吴虞也对其“提倡实事实功”^④的学术思想推崇备至。

解放后,由于“左”的思想的影响,费密被戴上“镇压农民起义”的帽子而一度遭受冷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本着历史地、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费密又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仅就其教育思想聊呈管见。

费密出身于教育世家。祖父费嘉诰为大竹县训导,属于主管教育的官吏,而且“明经训士有法”,算得上一个小小的教育家。父费经虞曾任云南昆明知县,辞官后的大半生,也以教书治学为业。至于费密本人,教书生涯就更长了。早在沔县居住时,便以教

书养家。他父亲在《遣儿密往褒城授徒》一诗云:

送汝出门去,高堂泪黯然。
病来今更瘦,乱世久无钱。
斑白来千里,全家食一编。
艰难宜力学,大父是先贤。

费密流寓泰州后,更以教书著书为业,直至终身。江左和楚中许多学士都受业于他门下,尤其“晚年四方来学者颇多,高才宿学,一时称得人最盛。”他教授门徒和子孙,“言必本之人情事实,不徒高谈性命为无用之学”,教“诗文法最严,不轻许可,故凡得闻其余风,诗文有法度”^⑤。严师出高徒,费密的弟子休宁、蔡治、田金等,皆知名于世。他的儿子费锡琮、费锡璜均成为有所成就的诗人和学者,也与他教育有方相关。

费密不仅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而且将经验上升到理论,撰写有《原教》、《费氏家训》等教育专著。《费氏家训》今已失传,但仅从《原教》等文中,就可以看出他对教育有许多精辟的见解。其中的“教成治定”论,是他对教育理论宝库一个重要的贡献。

费密在总结历史上创业守成的经验中写道:“帝王所以创基保土,非一人之得已也,皆有良臣为股肱焉,心膂焉,爪牙焉,乃能永定弘业,传世保位。夫君犹五岳、四渎、名山、大川也,佐辅之臣则山之巨木、茂草、鸟兽所栖息,川之涛波濂回,鱼龙所鼓鬣也。苟山童而川涸,恶足以滂润雨泽、流衍田畴,蓄百谷以士女乎?”^⑥他认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帝

王，周围必须聚集一个不同类型、结构完整的人才群体，各自在所处的岗位上尽心竭力，发挥作用，以作帝王的股肱、心膂、爪牙，否则，“非文臣为之谋，无以怀将而料敌国；非武臣之战，无以平纷扰而定四方”^⑧。

那么，兴国安邦的“文武臣工”从哪里来呢？靠教育培养。正如古人所说：“建国君民，教育为先。”^⑨作为思想家的费密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而他提出的“教成治定”论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造就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需要兴办教育，兴教乃人才之本；另一方面要“化民成俗”，纯正世风，也需要教育，兴教乃振奋民气之道。在费密看来，人民重师道和重君道一样重要。他说：“君道立则事安，治之要也，明礼义所以善事者也。”^⑩发展教育，尊师重道，让人民明达礼义，是一个国家“治平”的“久远之策”，是一项千秋大业。费密又说：“唐定天下，其主好文，其臣皆多才力学。”^⑪“好文”、“多才”、“力学”，都与发展教育紧密相关。相反，则会“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

“教成治定”，这已为世界无数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所证实。美国、苏联、日本和亚洲的“四小龙”的经济起飞，无不是以发展教育，造就人才，改造世风入手而获成功；相反，凡是轻视教育，任其世风颓败，“读书无用论”抬头的国家和政府，都是缺乏治国远见的。

在实施教育的过程和教育培养目标上，费密也有其鲜明的主张，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注重天性，因德育才。费密在《原教》中写道：“夫性天生者也，故其德不同，有智焉，仁焉，圣焉，义焉，中焉，和焉。”根据人的遗传因素和心理品质，把人化分为“智、仁、圣、义、中、和”六种类型。他指出：“智则足以照烛事机，仁则足以涵

育万类，圣则足以通达幽隐，义则足以断宰善恶，中则不偏，和则不厉，此德性之美者也。”^⑫这六种美对一个人的立身处世十分重要，如将其付之于行，就能对社会发生重要作用。他说：“德美则有立乎巨民之上之本矣，必见之于行，而后足以美德孝于亲，友于昆弟，睦于宗族，姻于婚媾，任于里党，恤于孤寡，如是其行也，而德之修远矣，治事之才犹未成也。”^⑬在费密看来，人的思想品德、个人心理特点，是先天固有的，而不是后天培养的。但是具备了这六种美德还只是取得了适应社会的能力，还不具备“治世”的才能，而要获得“治世”的才能，还需要后天的教育培养，需要因德育才。费密将德才截然分开的观点，看来不太科学，但他承认人的心理品质有着天然的差异，这比笼统地谈人的“性善”、“性恶”，则又进了一大步。

才当于用，六艺并重。为了培养具有“治事”能力的人才，费密十分强调“习六艺”。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教育内容，这是我国从周以来形成的教育传统。费密从他所处时代对人才实际需要出发，对六艺的作用和内容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礼以立身，乐以和气，射以观德，御以达能，书以通事，数以理才，六艺成而才当于用，故德性不可强者也，行与艺则因教而异焉。”^⑭“当于用”是教育树人的出发点，其目的在于培养造就“馭民治政之实才”。

费密所处的明清之际，社会危机日趋严重，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开始萌芽。费密从当时的实际出发，提出了“通四民”的主张。他所谓的“四民”即农、工、商、士，这是组成国家的主要成分。其中的士居于国家的统治地位。费密指出：“士不讲六艺以率其子弟，仁义之泽不渐，鲜材通识达可以政治事之人，则五教不宣，伦常失叙，强暴得以诬上行私，其

国不雅顺以久远。苟四民失业，闾阎有饥寒侵夺之患，礼乐崩颓，外内不测，于是起而教亦无所施矣。”^⑤由此可见，费密施教的六艺比起周秦时代的六艺来，内容就更加丰富，目的也大有差异。费密强调六艺并重，关键在于培养造就“当于用”的“治事”人才。

讲求事功，反对空言。费密在政治上旗帜鲜明地反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崇尚虚浮的风气，在教育思想上则坚决主张讲求事功，反对空言。他说：“令习实事，如礼、乐、兵、农、漕运、河工、盐法、茶马、刑算，一切国家要务，皆平日细心讲求，使胸有本末，定见异日得施于政。”^⑥这样的人才当用才真正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费密引用何塘的话说：“学以政为大，余小节也。”重致世之实才，弃无用之浮谈，这是费密的一贯思想。他坚决反对那些“尽弃实用，而专托空言”，盲目读书，醉心于八股文的书呆

子。他淋漓尽致地揭露出那些在当时科举制度下造就的人是那样的浅薄无能，他说：

“有问以簿书钱谷之教，天下几何？茫茫不知对也，始知书不可多读，平日为八股误了许多功夫，徒不识时务，良可叹也！”^⑦费密十分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实用，反对与实事不相干的高谈宏论。他说：“读书不读律，致君终无事”。死守书本，连国家的政策法规竟一无所知，这样的人对国家是没有用处的。他又说：“舍事实而传空文，必入于虚浮幽静矣。”^⑧脱离现实，只讲空洞无用的理论，学后作为茶房酒肆聊天尚可，用于治事济时怎么能行？费密痛切地指出：“自宋以来，天下之大患在于实事与议论两不相侔，故虚文盛而用事薄。”^⑨他把自宋以来盛行的议论脱离实际的空谈风气视为天下的大患，看作国势衰微的祸根，令人振聋发聩！费密坚持教育要讲求事功，主张理论联系社会实践，这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意义的。

注 释：

① 费锡璜《费中文先生家传》

② 蒋士铨《题费此度遗像》

③ 《新繁县志》

④ 《胡适文存》二集卷一

⑤ 费锡璜《费中文先生家传》

⑥ ⑩⑪⑫⑬⑭⑮⑯费密《原教》

⑦⑧费密《辅弼录论》

⑨《学记》

⑫⑬费密《吾道术》

⑭费密《先王传道术》